

TUXIANG YU HUADUO

图像与花朵

Tuxiang yu huaduo

陈离 著

但是鲁迅也放弃了做一个“游魂”。
他选择了做一个“人之子”。也就是
做“人的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做
“中国人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选择。



图像与花朵

陈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与花朵/陈离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309-09878-5

I. 图… II. 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9090 号

图像与花朵

陈 离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5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78-5/I · 776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声音与印象
003	棉袄的回忆
009	我的高考故事
014	没有房子的花园
033	“非典”时期的一封家书
045	图像与花朵
067	童年往事
082	往事三章
105	树叶何田田
122	田田上学记
168	“神之子”、“游魂”与“人之子”
174	怀念一个人
186	内心的死亡与自我的分裂
198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白痴”
209	恶的平庸与善的丰富
222	“魔界”与“佛界”

231	“深刻的人”
237	短文三篇
245	困难的写作
250	写什么？为什么写？
255	附录：问答录
267	代后记：“对灵魂的忧虑”，还是“对世界的忧虑”？

声音与印象

第一次被音乐打动是在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的事。

我记得的是,十多岁的时候看电影《农奴》,里面的插曲深深地打动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喇,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啊……再苦也有边喇……”那拖得很长的调子,里面有无尽的哀愁。估计曲调来自藏族民间底层的歌谣。那是一部黑白片的老电影,“文革”期间曾被禁演。“新时期”后得以重见天日。

我的音乐启蒙来得非常晚。

对音乐更早的记忆来自乡间的有线广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那几乎是一个孩子能够听到外界声音的唯一渠道。那时候的有线广播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了,但它是一个孩子眺望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可能是线路和喇叭质量的问题,有线广播的声音非常不好。有时候有很多的杂音,有时候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一个方法:从水缸里舀来一碗水,加进一些盐,然后沿着地线浇下去。果然有效:声音变得更响亮了,而且杂音也少了。

我的家离长江不远。小时候的记忆中,春夏两季总有太多的雨。防汛成了大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晚上广播里常常有长江水文情况的报道。我的记忆里就老是有有一个中年女播音员的声音:涨、

涨、涨……前面是地名：武汉、宜昌、沙市、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城陵矶等等，地名后面是数字，表示那个地方的长江水位，多少多少米。不停地涨、涨、涨，很少听到落、落、落（可能是水位下落的时候，防汛的任务不再紧迫，因此有线广播也就不再播报长江水文情况了）。外边是无边的夜，大雨哗哗地从天上落下，仿佛永远也不会停息。屋子里是昏暗的煤油灯光，或者根本就没有灯光，而是和外边一样的黑夜，这时候听到广播里传来的“涨、涨、涨”的声音，一个孩子的心中真是充满了无限的恐惧。

这个记忆与音乐无关么？

与音乐直接有关的记忆是我同样躺在黑暗中。有线广播还没有停止，新闻和宣传之后，会播放一些“革命歌曲”。有一段时间经常播放的是抗战时期流行的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筑路歌》，是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的合唱：嗨哟，嗨哟，嗨哟……特别有力量，特别振奋人心。它仿佛在昭示着，就是在最困难、最黑暗、最泥泞的日子里，人心也是不死的。

棉袄的回忆

小时候家里有多么穷，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不起一块五毛钱的学费，我一个学期没有课本，上课与做作业只能借同桌同学的课本用。那是1977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文革”结束了，生活充满了希望，但物质上还是极度的贫困。

小学升初中考试，我考了全乡第一。那时候已经恢复了高考，人们重新开始重视读书了。对于农村的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考了全乡第一，一时我也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不知道是谁告诉我升学考试考了全乡第一，反正我知道了，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校长家领初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兴致勃勃，期待着校长的表扬。我考了全乡第一，我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校长一定也觉得脸上有光。但是校长说：你不能拿入学通知书，因为你这个学期的学费还没有交。你回家，叫你爸爸妈妈把学费交了，就可以来领录取通知书了。

我空着手，满心失望地回了家。后来父母是怎样设法补交了一元五角钱的学费，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今天，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近于“天方夜谭”。但是如果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壮年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值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遇到灾年荒年，甚至是负值，即你出工越多，欠生产队的便越多——你就不觉得这件事奇怪了。一块五毛钱，差不多是三十个鸡蛋的价格。鸡蛋卖了钱，是要用来买盐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天，妈妈做饭的时候发现家里盐罐里盐没有了，就找出两个鸡蛋，叫我到大队供

销社代销店里去换盐。

人不吃盐，便活不下去。比起书，盐当然重要多了。没有菜吃的时候，盐也可以当菜。一种粗盐，尽可能碾碎了，然后在锅里用大火炒一炒，便可以用来拌稀饭吃。这样的稀饭吃多了，胃是什么感受，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还好，这样的稀饭也不是总能吃上的。从记事开始，小时候的主食是红薯，红薯蒸着吃，煮着吃，烧着吃；红薯也没得吃的时候，就吃红薯干。陈年的红薯干，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霉味。听说本来是给马吃的，马也不吃，便给人吃。

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里发生的事。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现在的人担心“暖冬”，冬天不冷，说明地球的环境正一天天恶化，有一天人无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了，人类所有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对的。但是小时候的我们，只希望冬天不要那么冷。那时候的冬天总要下好几场大雪，河里结的冰厚到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跑，手冻僵了，拿不住筷子，握不住笔——因为总穿不暖和。

我不记得小时候曾经穿过新棉袄。家里兄弟姐妹多，我穿的总是哥哥们穿剩下的，哥哥们再也穿不得的棉袄。时间长了，里面的棉花已经板结了，面子也破了，上面打着补丁。母亲不让我们穿露出棉絮的破棉袄，但她无法不让我们穿打着补丁的棉袄。她能做的，是让补丁的颜色和棉袄面子的颜色尽可能接近。

有一件棉袄，上面的补丁实在是太多了，我不爱穿，我不想穿，那时候我已经懂得“臭美”了。穷人家的孩子，也是懂得“臭美”的。而且，没有罩衣，必须直接穿着那件满是补丁的棉袄去学校上学。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穿着这样的棉袄去学校，同学们一定会笑话我的！我从小就怕被人笑话。这和家里的成分有关。土改时爷爷被划成地主，因为家里有几亩地。这让我从小就变得分外敏感。同学和我吵架的时候，会大声叫一句：蜘蛛！我到处看也见不到一只蜘蛛。确实没有蜘蛛，

但是同学还是那样大叫了一声：蜘蛛！“蜘蛛”就是“地主”，同学在提醒我，时刻不要忘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虽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祖父就去世了。我从一出世感受到的就只是家里的贫穷，比当时一般人家更彻底的贫穷。

上小学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读书再好，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也是没有资格考大学的。父亲常常感叹：孩子，你读书这么好，也没有用啊，只是养养骨头而已，长大了还是得回家种田！后来，改革开放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有可能考大学了。大家都认为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家里也希望我早一点考上大学——似乎我一考上大学，便一切都好了。那时候饭能够吃饱了，但家里还是穷。全家那么多人，有一年过年，母亲只称了半斤肉，因为家里只有五毛钱，只买得起半斤肉——半斤肉怎么做那么一大家的年夜饭呢，真是难为了母亲。

我初中读了两年，就转学到另一个乡去上高中。家里太希望我早一点考上大学了，以为我考上了大学，家里的境况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我的转学曾引起了两所乡村中学之间的矛盾。我原先就读的学校和转学去的学校，都将我视为可以造就的“苗子”，高考可以为学校争光的。那时候，一个乡村中学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79年，我转学到了另一个乡下面的一所村级中学读高中。那个乡在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上，过去叫八宝洲，后来改名叫“棉船”。棉船这个名字是建国后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起的。沙洲的土质特别好，棉花高产，而且品质很好，一时间“棉船”很有名。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江西时也到过那里。

我是学校的希望，更是家里的希望，但家里还是不能为我做一件新棉袄。冬天依然很冷，不穿棉袄是过不去冬天的。我终于有了一件棉袄，是姑妈送的。姑妈送给姐姐穿的——以前是表姐穿的，表姐出嫁了，便送给姐姐穿，姐姐也穿不得了，便给我穿。

那是一件花棉袄。红底上有白色的花，棉袄倒是一点也没有破，红底白花也很好看，但，这是一件女孩子穿的棉袄啊，一个男孩子怎么能穿到身上呢？那时候，我十四五了，开始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情感，叫“爱情”。我暗暗地喜欢上了班上一位女同学。她的成绩没有我好（但也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她的家境比我家好多了。她父亲是有工作的，每个月有工资拿。虽然每个月的工资也很少，但只要是家里有人拿工资，在那时的乡下便属于上层人家。我觉得她长得很好看，穿的衣服也很好看。她父亲有时会去上海出差，她身上有一件衣服是她父亲从上海给她买的。我经常偷偷地打量她。我觉得她也会偷偷地打量我。

我在她面前很自卑。这是不可能的，她怎么会爱我呢？虽然我成绩好，总是在班上考第一，老师上课时总是把我的名字挂在嘴上，但是她还是不会喜欢我。我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我的身上穿的是姑姑送的表姐穿过然后姐姐也穿过的花棉袄。

还好有一件蓝色的罩衫。那件罩衫的来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件罩衫本来也是女式的，但母亲把它改造了一番，领子和纽扣都换掉了，我穿在身上看上去倒也大大方方。但上体育课的时候，风吹起了那件蓝色的罩衫，露出了罩衫下面的红底白花的棉袄。班上所有的同学都看见了。她一定也看见了。她就站在我后面一排。丢人，真是丢人，实在是太丢人了。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因为贫穷，多少孩子的幸福被剥夺掉了啊！觉得作家说得真好，作家是懂得生活，懂得人心的。

高中我也只读了两年，便去考大学。考大学之前的那个学期，我得了胸膜炎，医生说，这种病，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那时候的高中生，常常是一瓶咸菜吃一个星期，我因为住校，离家很远，有时候连咸菜也没得吃），高考的压力又那么大，不生病才怪。出院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上考场了。

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尽管考上的学校与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

那是1981年，社会充满着希望、生机和活力。但是家里的贫穷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那时候的大学生被看作是“天之骄子”，但冬天我依然没有棉袄穿。——不仅没有棉袄穿，连春秋天穿的外套也只有一件。一件外套穿脏了，实在不能再穿了，得找一个大晴天，头天下午赶紧洗了，第二天一早干了，又可以穿到身上。

有一天，看上去是个晴天，我下午洗了那唯一的一件外套，但晚上却下起雨来。第二天衣服自然干不了，但又必须去上课。我就穿着那件湿漉漉的外套走进了教室。班上不少同学以一种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但是没有人问我为什么穿着湿衣服上学。也许他们都知道，但没有人问。他们是怕我太难为情了吧？这样的体贴会让我永远记在心底。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同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年冬天，我用研究生的助学金，买了第一件棉袄。我和一位来自于东北的同学一起去买的。我们两人买了一模一样的棉袄，式样有些老气，可以两面穿，一面是蓝色，一面是咖啡色。这件棉袄，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北京三年的求学生涯。

从那时候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的冬天不像过去那样冷了，但是家里的衣柜，棉袄是一件一件地添置起来，羽绒棉袄，夹克式棉袄，休闲棉袄，不同的天气，可以换着穿。

前几天，妹妹从香港打来电话，说她在那里逛街，看到一件棉袄，我穿着一定很合适。她要我的地址，说要买了寄给我。我说不要不要，我的棉袄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添置了。而且，从香港寄东西到南昌，一定很麻烦吧？

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一个很大的航空包裹。除了棉袄，还有好几件毛衣和衬衫（一共10件）。光一件棉袄，就要一千七百多港币。真是太奢侈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为着基本的生存，四处辗转奔波，辛苦挣扎，走着异常艰难的人生道路。

我也知道，妹妹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她的心意。也用这样

的方式，叫我不要担心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对她的公司的影响。

至于妹妹怎样从一个乡村女孩子，去广东打工，从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女工做起，到创办了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那是另外一个故事，留待以后再说吧。

我的高考故事

小时候我读书成绩很好，曾被老师和同学看作是“神童”和“天才”。老师都喜欢会读书的孩子，我太会读书了，从小学到高中，每次考试，所有的科目我都得第一，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可能是有点被老师宠坏了。后来我的坏脾气，大概与此有一些关系吧。

但是成绩再好也没有用的，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文革”期间更是取消了高考，改为推荐上大学，具有被推荐资格的，当然是那些“根正苗红”的青年。

喜欢和看重我的老师都以一种遗憾的眼光看着我。一个孩子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已经被打入了另册，谁能有什么办法呢？

1977年的春天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不曾亲历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吧？“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连我这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有可能参加高考了！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推动这种历史转折发生的邓小平确实是位东方巨人。

1977年的夏天，我参加的是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记得数学考试我很早就交了卷，一个人跑到教室外面，看着那么多同龄人都还在紧张地答题，心中颇为得意。我的这种做法，当然出自一个年少气盛的人的虚荣心。我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果然有巡考的老师注意到了我，问我怎么这么早就交卷？我得意地说：我答完了啊！那位老师又问：都答对了吗？我说：那我就知道了！说话的口气一点也不谦虚，有点猖狂。后来成绩出来了，我的数学成绩是一百分，满分。语文成绩

不记得了，反正也是全乡最高的。

那确实是一个春天的故事。生活重新开始了，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心中满怀着激情，每一天未来都在向我们招手。我要上大学！我要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在一个乡下孩子的心目中，大学（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学）有多么神圣啊！想一想吧，一个乡下孩子，一下子能变成那么有名的大学里的一名学生，这种变化该有多大，这样的未来该有多么美好和辉煌！

家里也希望我早一点考上大学，越快越好！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都不好，哥哥们结了婚，单门立户过日子了，姐姐出嫁了，弟弟和妹妹还在上小学，生活遇到了新的困难。解决一切困难的办法，就是我早一点考上大学。家里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似乎我一考上大学，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中国科技大学开始招收少年班了。江西出了个神童，叫宁珀，他十三岁就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了。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啊！那时的《江西日报》有一整版的关于宁珀的报道。我记不清从哪里得到了那张报纸，那是一篇很长的报道，应该有一万多字吧。我正好在学校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奖，奖品是一本小小的笔记本，我工工整整地把那篇报道全文抄到笔记本上，随身带着，经常翻看。我的榜样就是宁珀，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下一个宁珀。我小时候不是也曾被老师看作“神童”吗？宁珀是神童，我也是神童！

那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不是神童。我怎么可能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呢？宁珀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师，他从小就读过许多书，许多书是连大人都没看过的，看不懂的。他还会下围棋，而且下得很好，而我连围棋是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乡下孩子，知识是那样贫乏，想考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不过是“夏天里的一个春梦”罢了。

相约和我一起做梦的同学是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很快我就与他分别了。他留在乡中学读初三，我则转学到另一所中学读高一。而我必须尽快地考上大学，越快越好！

我高中只读了两年，就参加高考。那是1981年。那时候高考的竞争远比现在激烈得多，因为那时候的大学远没有现在这样多，高校更不像现在这样扩招到动不动就过万人。我就读的是一所村级中学，全部校舍就是村里过去一户有钱人家的宅院。师资更是欠缺，全校所有的教师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位。

文科老师只有一位，据说是“文革”前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的许先生。许先生教我们英语、历史和地理。许先生教书很是认真，教我们外语时，认为班上的同学基础普遍都很差，上课时用的是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教起！光是ABCDEFGH……就整整教了两节课！每一个字母写到黑板上，许先生都要花很长时间，写的时候特别用心、用力，手挥动起来，幅度很大，那姿势在我们看来是很优美的。写完后还要仔细打量一番，如果觉得写得不够好看，要擦掉重新写过！到高二结束的时候，我们连初中二年级的英语课本也没有上完！

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到母校去看望老师。那天许先生也在。每一个中学教师都非常关心自己所教的学生的高考成绩吧，许先生也不例外。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见到我，用满怀期待的眼光看着我，问我高考英语成绩是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老师：27分！一百分的卷子啊，我只考了27分！真是太差了！但我的成绩却是全校最高的！许先生也有点难为情，他连忙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确实是没有办法，我们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许先生是认真的，但是面对高考残酷的竞争，他的教学方法也实在是有些问题吧？

最痛苦的是我想学文科，但只能选择理科。全校文科只有许先生一位教师，过去的高考成绩实在是太差了。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文科，对自己的前途有点太不负责任了。而家里是那样迫切地期待着我早一

点考上大学！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只能是放到一边的。另外，那时候也重理轻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文科，是那些成绩很差的学生的选择，考上大学总比考不上好啊。成绩稍好一点的学生，是不会选文科的。

我多么喜欢语文啊！我的作文一直写得很好，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在班上当范文读。我多么喜欢读书！我利用星期天放假，约上几位要好的同学，分别去了彭泽县城和邻近的望江县城，唯一的目的是去那里的新华书店买书。那时候连县城的新华书店也是有不少好书的。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书才是真正的好书。现在我记得，当时买下的书有《安徒生童话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神秘岛》（那真是一本迷人的书，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印象是如此深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间的手抄本成了新时期刚开始那个年代的畅销书），还有一本德国人写的《马克思传》，很厚的一本书，里面有很多黑白照片，价钱要一块多钱！实在是太奢侈了！

那时候上高中，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只要五块钱。但就是五块钱，家里也要想方设法去筹措。我买一本书就花了一块多钱，真是太“大手大脚”了！而且，这些书都是与高考“无关”的啊！周围多数同学都在进行“题海”大战，我却在看《安徒生童话》，我这个人，真是太不成熟了啊！

但是那些书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理科成绩越来越差，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老师找我谈话，对我讲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也都懂，但这仍然无法阻止我找机会偷偷地把那几本书看完。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生病住院了。医生说是胸膜炎，是压力太大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我在医院里待了四十多天，天天惦记着高考。那四十天，母亲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母亲没有说什么，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她的心疼和着急。